



於補充英語學習環境外，舉設該中心外語會考試區，讓具有良好學。 趙芳表示，劍橋大學英語能應求僑力，世界各國相莫知。 的英語檢定，包括托福考試 聽、讀、白試部分。由外籍考官和學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主編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台灣傳媒再解構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主編

◎ 巨流圖書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台灣傳媒再解構／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主編。--
初版。--台北市：巨流，2009.06
面；公分

ISBN 978-957-732-324-8(平裝)

1.大眾傳播 2.傳播產業 3.傳播管理 4.
文集 5.台灣

541.8307

98010234

台灣傳媒再解構

主編：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發行人：楊曉華

責任編輯：黃惠茹

封面設計：曾瑞靖

出版者：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編輯部：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政治大學集英樓2樓

電話：(02)86613898

傳真：(02)86615465

劃撥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mail: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法律顧問：林廷隆律師

電話：(02)29658212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57號2樓之2

電話：(07)2265267

傳真：(07)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 978-957-732-324-8

2009年6月初版一刷

定價：55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出版緣起

為優質新聞與傑出記者而努力

蕭 新 煌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第二屆董事長）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是為了肯定和獎勵優秀新聞記者而成立的。

新聞記者此一專業的特殊性，在於一個記者不論隸屬於哪個媒體，或擅長哪種路線，都應該是秉持報導事實真相、維護社會公益的前提去進行每日的新聞工作。記者不該只是一種謀生的職業，它頂著民主社會第四權的冠冕，又揭櫫言論自由的崇高價值，再加上自主性極強的作業方式，讓記者行業經常充滿個人主義色彩，有時又帶一點英雄主義氣質。

相較於學者專注與知識體系對話，記者較了解如何與社會大眾溝通。又由於經常站在重大事件的現場，他們必須目睹真相，見證歷史。在他們深入淺出、肌理生動的筆觸下，影響人類歷史的重大事件或關鍵人物，乃躍然紙上，栩栩如生。無怪乎在許多西方國家，最受歡迎的歷史人物傳記，往往出自於有新聞工作背景者之手。

當前台灣的媒體環境實在令人很不滿意，不但有過於追逐市場、短視近利的經營心態，又缺少身為社會公器的組織自覺。一些優秀的新聞從業人員，在一開始有著滿腔熱情，卻囿於大環境，終究無法施展抱負，而挫折失望。

卓越新聞獎書系的出版計畫，就是為了鼓勵那些有志新聞專業，始終不放棄理想的傑出的資深記者，能將多年來在工作中的見聞和心得，經有系統的分析、整理後，以專書出現。這一書系的出版目的一則是要彌補報

紙、雜誌或因篇幅有限，或因市場考量，所造成的題材限制；二則強調對特具意義的議題能有論述、剖析的深度與廣度。

此外，我們也希望引介國外優秀的新聞作品，讓他山之石做為本土借鏡，透過精良的譯筆，讓國內實務新聞工作者，及有志入行的傳播科系學生，也能有見賢思齊的機會。

今日的新聞，有可能是明日的歷史。新聞記者想做第一線的歷史紀錄者，其作品品質的良窳，乃直接影響公眾耳目的清暗和善惡判斷。如果此一書系的出版，對台灣記者的專業品質、工作經驗累積，以及工作成果發表能有貢獻，那我們的努力便沒有白費。

前言

1993年，澄社出版了《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一書，由鄭瑞城教授召集並編輯，以學術的筆法，分析當時廣播電視的實踐問題，可說是為學術服務社會樹立了一個典範。如今回想起來，這些年來台灣不少重大的廣電興革措施，包括人人耳熟能詳的「黨政軍退出媒體」，其最初的完整觀念，無疑始自《解構廣電媒體》。澄社諸君子承襲了文人論政的中國傳統，人在江湖而心繫國事。以現在的社會價值來衡量，他們的作為真可以說是無愧於生他們、養他們的台灣土地和台灣人民了。

本書《台灣傳媒再解構》原出於鄭瑞城教授的構想，作為《解構廣電媒體》的續集。他不但是前一本書的「始作俑者」，還自動請纓「重作馮婦」，完成本書出版的前半段的規劃和聯繫工作。就在徵稿即將結束之際，鄭教授工作忙碌請辭，改由我接手本書未竟的編輯雜務。這篇〈前言〉，是要對本書的題外之義略作交代。

* * * * *

2008年一月是報禁解除二十週年，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特別舉辦了一場研討會，邀請學術界和傳媒產業界人士出席討論報禁解除二十年之後的台灣傳媒，會後就宣讀的文章較具業務性質的，合輯編成《關鍵力量的沉輪——回首報禁解除二十年》一書，已由巨流圖書公司出版。其他文章學術性質較濃者，加上研討會會後另行邀約的稿件，則合輯一起，編成了本書《台灣傳媒再解構》。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成立於2002年，創辦人是徐佳士教授。本書以學術型態問世，與徐教授的行誼志業同調（對學術濟世的一貫堅持）。2008年是徐教授的米壽，卓新會董事會同仁及參與本書編寫的門生故舊，謹以本書為賀，祝福他那永不間歇的睿智妙語永遠生猛有力。

* * * * *

從《解構》到《再解構》，十五年間依稀可以看出台灣傳媒與社會環

境的變與不變軌跡。變的是傳媒科技、傳媒生態。傳媒與人的關係，也由早先傳媒是人們可有可無的「身外之物」變成傳媒是人們生活中「不可一日或缺之物」；傳媒就是當代的文化。這樣的變化不可謂不大。

不變的，是傳媒價值觀或心態：表面上威權強人走了，傳媒卻依然是政治和經濟的侍臣、婢女；圈內人都知道「走了警總，來了 MBA」，傳媒依然是權勢或商業的工具。

不變的是主流思維對於傳媒自由市場的過份信賴。傳媒解禁是何等大事，我們在解放四十年威權統治的禁錮時，居然沒有任何配套措施，聽任一百多個電視頻道每天為零點五個百分點的收視率，而墮落在紅海中相互廝殺；我們雖然廢除了以壓制和整肅為基調的「出版法」和「新聞記者法」，推出了「傳播通訊管理法」，但也未曾出台配套措施，而聽任報社關門、中道言論見棄。此類的不作為，卻美其名為新聞自由，無異於將新聞自由變成了傳媒產業墮落的一塊遮羞布。看看我們四周，正是那些高喊維護新聞自由卻棄社會責任如敝屣的人在作賤新聞自由！

* * * * *

我們需要換腦袋，為日新月異的新傳媒產業帶來新觀念、新思維。傳媒對現代社會太重要了，我們需要許許多多的論述走在政策之前。缺少政策論述，正是台灣傳媒產業的長年隱痛。缺乏一個中道的傳媒產業，肯定是社會的重大損失。

我們建議依循主流普世價值，從速訂立「傳播基本法」，保障傳播人權，明訂成立負責傳媒產業研究的智庫，為明天的台灣傳媒產業發展提出中道論述。在此之前，以本書的編寫，希望能稍稍彌補此中論述的不足。

陳世敏（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

2009 年 4 月

台灣傳媒再解構

出版緣起 / I

前言 / III

解構傳媒思維

第一章 台灣傳媒與民主變革的交光互影：媒介政治經濟學的悖論 李金銓 / 3

重構廣電結構

第二章 廣電開放政策的回顧與前瞻 洪瓊娟 / 23

第三章 電視服務產業的流變：政經勢力的消與長
陳炳宏 / 43

第四章 黨政軍退出媒體之後？無線電視所有權的演變
與規範 洪貞玲 / 77

第五章 台灣電視節目品質：擺盪於創造性毀滅與重生的
歷程 鍾起惠 / 103

第六章 台灣傳媒行政管制體系的解構與重建
羅世宏 / 125

建構傳媒匯流

第七章 台灣報業的問題 徐榮華、羅文輝 / 153

第八章 變遷與挑戰：解禁後的台灣報業 林麗雲 / 177

- 第九章 大媒體，小記者：新聞媒體勞動條件與工作者組織 劉昌德 / 199
- 第十章 資本興衰，國家進退：台灣電影產業的歷史分析 魏鈞 / 221
- 第十一章 台灣網路公民媒體的發展與挑戰 陳順孝 / 239

架構傳媒政策

- 第十二章 台灣媒體改造運動的歷程與展望 管中祥 / 279
- 第十三章 台灣的網路政策在哪裡？解構與重塑 劉靜怡 / 311
- 第十四章 公共媒體如何問責：以台灣的公廣集團為例 翁秀琪 / 343
- 第十五章 邁向媒體自律：NCC 廣電監理新政策 林東泰 / 363
- 第十六章 媒體素養：傳播教育通識化的途徑 吳翠珍、陳世敏 / 387
- 第十七章 兩岸傳媒交流的回顧 馮建三 / 421
- 第十八章 問題媒體之挑戰與台灣媒體法之回應 蔡明誠 / 445

解構傳媒思維

第一章 台灣傳媒與民主變革的交光互影：媒介政治經濟學的悖論

第一章

台灣傳媒與民主變革的交光互影： 媒介政治經濟學的悖論¹

李金銓

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兼傳播研究中心主任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退休教授

摘要

自由多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主要在批評國家，有助於分析威權戒嚴體制下的台灣媒介；激進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主要在批評資本，有助於分析解嚴以後的台灣自由／資本媒介。然而，在轉型的社會中，這兩種觀點可能同時不安地交叉並存。台灣解嚴以後，第一種觀點雖仍重要，卻逐漸失焦；我們必須帶進第二種觀點，檢查資本重組如何扭曲傳播秩序，而與民主理想背道而馳。政府對於解禁沒有全盤的遠見，沒有整體的計畫，一味因循苟且，以致造成了資本的浪費與文化的亂象。台灣亟需發動新的公民運動，再度全盤檢討傳播秩序。

關鍵詞：媒介政治經濟學、戒嚴、政府角色、資本重組、傳播秩序

¹ 本文第一稿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3年6月號，第77期，頁3-17，收入李金銓《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25-44。英文版見Chin-Chuan Lee（2001），“Rethin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media and democracy in Greater China,” *Javnost-the Public*（Journal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8, 2: 7-20。有關台灣媒介轉型的詳細分析，見上引拙著，頁135-204。

壹、傳媒體制的思維

全球化的步伐隨冷戰結束而奔騰躍進，前蘇聯集團的政體紛紛崩解，亞洲、拉丁美洲各威權政體發生戲劇性的轉變，全世界媒介研究蓬勃發展，顯示以西方為中心的媒介研究必須重新定位。英美的媒介政治經濟學家通常漠視比較的視野，他們的理論架構孕育於工業先進和政治穩定的富裕國家，無法解釋第三世界複雜而曲折的經驗。學界假設媒介必須服務、提倡並參與民主，其實媒介可以增進民主，也可以破壞民主。人類社會從來沒有完美的民主，將來也不會出現。不同的社會理論建構不同的民主想像，媒介與民主的關係論爭不休，常取決於用甚麼規範性的標準和在哪一個社會脈絡中看民主。Dahlgren（2000）站在後現代的角度聲稱，在西方國家人們對宏觀的代議民主已失去興趣，他們遠離以國家、國會、政黨為長期認同的政治，轉而投注到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認同，這種微觀政治的特徵是以階級、性別和種族差異建立短暫的聯盟。此外，論者說，在穩定的民主國家裡，媒介日趨瑣碎，向商業壓力低頭，製造無知，讓大眾滋生失落感。對此，我贊同薩伊德（Said, 1993: 329）的觀點：「在非西方，現代性（modernity）還是方興未艾，對那些被傳統與正統束縛的文化來說仍是巨大的挑戰。」《共產黨宣言》說：「幫助資產階級拉下封建主義的武器，正被用來對抗資產階級本身。」這說明了現代性在西方和非西方具有不同的解放潛能。如謂西方人厭棄代議政治，「非西方」的個人飽受國家暴力壓迫，追求代議政治而不可得。後現代主義者一味歌頌「生活方式的政治」（lifestyle politics），但如非西方人無懼於喪失他們牢固的代議權，「生活方式的政治」不知有何積極意義？後現代主義者又主張「全民民主」（popular democracy），但假如沒有堅實的自由（liberal）制度為基礎，恐怕也只是空中樓閣罷了。

西方批判派學者質疑人們安於現狀，為什麼人們不多反抗一點？人們要反抗的，我想不應是代議民主本身，而是代議民主的不足。西方批判派學者站在西歐和北美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 社會的邊緣地位，向權力中心的意理霸權發出戰鬥。他們追求理想的「第三條道路」，反抗資本主義的剝削，又反抗列寧主義的獨裁，其中最吸引人的莫過於哈貝馬斯 (Habermas) 提出的「公共領域」。Curran (1991, 2000) 用這個概念設計一套民主的藍圖，兼容並蓄民間、專業、社會市場和私人企業各領域的媒介。Carey (1997) 從杜威的實踐主義立場提倡「重獲公共生活」，所謂「公共生活」在歷史上可能沒有存在過，但這個概念可以刺激我們想像：除了成為現狀的俘虜，還有哪些「可能的政治」？冷戰結束，列寧主義破產，資本主義成為全球化的驅動力，Giddens (1998) 從自由左派建構以社會民主為基礎的「新第三條道路」，企圖跨越代議民主的限制，並把民主從政治延伸到經濟和文化領域。Curran (1991) 在一篇媒介與民主的宏文裡，呼籲讓自由派的概念「安息」，因為這些舊理念「與當代現實沒有太大關係」。在我看來，他的呼籲只會讓自由主義的觀點早夭，而不一定是「安息」，非西方國家多半沒有自由制度，媒介受到獨裁體制的控制，大家習以為常，Hallin (2000) 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勝利，表示自由派觀點漸失意義。」痴肥症和厭食症是富人的問題，窮人病在營養不良，問題截然不同。在自由民主國家剖析自由派的神話陳義過高，和在專制國家摧殘自由多元的價值（例如抹煞新聞自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完全是兩回事，本文打算援引台灣媒介的實據，來闡釋政治經濟的複雜悖論。

貳、媒介政治經濟學的兩種取徑

我曾經比較自由多元主義 (liberal-pluralist) 和激進馬克思主義 (radical Marxist) 的媒介政治經濟學，它們刻畫兩個不同的政治圖像，對媒介的民主潛能有殊異的期待，表 1 綜述一個對比的「理想型」(ideal types)，刻意放大文化的差異以便觀察對照，但我們在推衍時謹慎為要。首先我得說明，特定的中文語境常賦「激進」以「不理性」的貶意，尤其是「激進」和「四人幫」合在一起時更容易引起「瘋狂」的聯想，我在這裡用「自由」(liberal) 和「激進」(radical)，基

本上與庸俗的列寧主義及其變種無關，而是形容兩個（西方）社會理論對變革所採取的態度，本身沒有褒貶的意思：自由派贊成溫和漸進的局部變革，激進派鼓吹大刀闊斧的根本變革；自由派覺得激進派太冒進，而激進派覺得自由派不夠徹底，但它們歸根究底都在追求合理的社會和人類的解放。縱觀西歐歷史，早期資本主義從封建主義解放出來，自由派理論支持「負責任的資本主義」（responsible capitalism），反對專制王權踐踏個人主權；激進派企圖從晚期資本主義解放出來，站在理想化社會民主的立場，批評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累積漫無止境，財富分配不公。自由派強調自由，激進派鼓吹平等，兩派觀點都是現代性的一部分；激進派解放先進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自由派解放大部分受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統治的國家。我要強調：裁斷這兩派孰是孰非，不是一個先驗的問題，最後得看它們在甚麼脈絡（context）內能解釋多少經驗現象，這裡我僅能以粗筆描繪兩派之間的異同，無法細緻討論兩派內部的差異。

表 1 媒介政治經濟學的兩個取徑

	自由多元主義	激進馬克思主義
政治綱要	現實的、實用的和注重實效的政治；支持「負責任的資本主義」	理想主義，批判資本主義，支持各式的社會主義
政治經濟學的類型	「政治的」政治經濟學	「經濟的」政治經濟學
適用的地區	「晚生的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主要處於威權統治下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自由民主或社會民主
政權的角色	首要的，塑造經濟和媒介政策，威脅媒介自由	次要的和從生的
市場的角色	提倡多樣性，抵消專斷政權的權力	資本積累和集中限制媒介多元，並產生傳播資訊分配的失衡
媒介專業主義	提倡媒介多元和自主，「可信度的信條」	「策略上的儀式」，強化既定秩序；媒介專業人員在表達公眾聲音時專斷粗暴

激進馬克思主義者（譬如 Garnham, 1990; Golding and Murdock, 1997; Mosco, 1996; Schiller, 1992）從上往下看，我稱之為「經濟的」政治經濟學（“economic” political economy），他們抱持激進的人文主義理想，居高臨下，批判自由資本主義的市場背叛民主的理想，特別是「軍事與工業複合體」肆無忌憚地追逐經濟利益，製造文化霸權，導致「不完全的解放」和資源分配失衡，以至於扭曲公共領域。這個批評鞭辟入裡，但對國家（state）角色的解釋往往失之片面，而且頂多一筆帶過。激進派學者批評多元主義者太注重國家與媒介的關係，而忽視資本主義私有化對傳播工具產生甚麼影響，但他們自己何嘗不是把「國家」的角色邊緣化？揆其所以然，乃因為西方自由國家的政權對媒介的管制不像專制暴力那麼赤裸裸，何況在法律和制度上還保障媒介自由。激進派馬克思主義談到國家政權時，立場迥異：工具派學者（如 Schiller, 1992; Herman and Chomsky, 1988）認為國家權力逕自為大公司的利益服務，國家與資本異床同夢；其他學者（例如 Golding and Murdock, 1991, 1997）卻認為國家與資本也有緊張的一面，國家是民主鬥爭的中心場域，只有國家的力量足以挑戰大公司的利益，只有通過國家的機制才能促成社會財富的公平再分配。為此，後者鼓吹國家應該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場，矯正市場對公共表述所產生的扭曲，例如 Thompson（1990）主張國家積極干預媒介的產權秩序，以營造「管制的多元」（regulated pluralism）。Mosco（1996）呼籲批判派學者分析國家如何干預傳播工業的市場化、私有化和國際化。

無論如何，激進派學者始終未曾嚴肅分析過「專制政體」。耶魯大學媒介法學者 Fiss（1996）認為國家與民主既敵又友，國家補充市場的缺陷，卻不能取代市場的力量；但我敢斷言，開發滯後的國家由專制政權全面支配政經和文化資源，不僅掌握關鍵的新聞喉舌，建立整套新聞檢查和政治高壓的制度，並收編私有媒介到侍從關係去。有的激進派學者（如 Schiller, 1976; Smythe, 1994）提倡以前蘇聯、中國（文革時期）、古巴那樣粗暴的列寧主義取代剝削性的世界資本主義。這些專制統治如今已一一破產，這種先入為主的全稱命題碰到處理細緻的政治問題，實在無濟於事。

激進馬克思主義者從根本上批評資本主義。媒介專業主義孕育於資本主義的邏輯，他們認為這是一套為現有體制服務的意識形態神話。施雷辛格（Schlesinger, 1978）指出，媒介專業主義的前提是深信現有的自由民主秩序，根深柢固到不言自明的地步。換言之，唯有凍結社會制度的基本假設才可以談客觀、平衡這些專業技術的問題；我們一旦質疑第一層次的假設，專業主義必將失去立足點，更遑論向既有秩序挑戰了。Tuchman（1978）認為，媒介專業主義建造「策略性的儀式」（strategic ritual），幫助媒介維持一種客觀的假相，其實整個新聞網都是環繞合法的機構，新聞節奏跟官僚機構的運轉同聲共氣，以致支配性的觀點瀰漫於主流媒介，抹煞甚至消滅社會上的異見。媒介的長期的意識形態效果，就是葛蘭西（A. Gramsci）說的製造社會同意基礎，從而建立文化霸權；換句話說，激進派抨擊客觀報導拒絕審察權力與特權的基本結構。Carey（1997）譴責媒介專業主義賦專業人士太多權力，以致公眾從政治的「參與者」淪為「旁觀者」。此說糅合了對傑弗遜式民主的緬懷以及對哈貝馬斯式民主的憧憬，激進派知識批判的火力強勁，但對於新聞實踐影響微弱。

另外一面，多元主義者從下向上看，建構各種圖像和概念（如媒介專業主義、意見市場、制衡），用以對抗國家暴力的機制，我稱之為「政治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political economy）。自由派講究實效，不追求浪漫，卻給各種群眾抗爭和解放運動（包括民族、種族、性別、階級）帶來希望，並賦其以正當性。當代中國的學生運動，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到1989年的六四運動，無不以「民主、自由、科學和人權」為訴求。免於國家政權直接蹂躪的市場秩序，當然比各種貴族式的、寡頭式的、獨裁式的政權轄下的市場更自由更解放。

激進馬克思主義抨擊媒介專業主義，自由多元主義則視之為一個理想，既促進意見多元，又鼓舞媒介制衡權力結構。自由派的政治是可能的（possible）政治，目的不在建造理想的道德王國；它承認人類的不完美性，提倡溫和改良，懷疑任何宏大的設計，反對大規模狂風暴雨式推翻整個既有秩序。從台灣、南韓、墨西哥、南非以及南美這些例子來看，市